

苏方桂

文集



羊城丐王

中国文联出版社

羊城西王

苏方桂

文集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苏方桂文集之羊城丐王/苏方桂 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9.5

ISBN 978-7-5059-5988-0

I 苏… II 苏…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12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 (2009) 第 269330 号

书 名	苏方桂文集之羊城丐王	
作 者	苏方桂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顾 苹	
印 刷	北京通州图文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0 印张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5988-0	
定 价	全套 160 元 (本册 23.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通俗传远 创新动人

(序一)

苏方桂先生是我的老朋友。他的故乡为辽南古镇熊岳城，我曾在这座古镇所在的营口市工作过，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们就相识了；虽然睽隔两地，南北分襟，但共同从事的文学事业，又把我们联结在一起，彼此相知相重，结下了深厚友情。先生文集近日即将付梓，索序于余，却之不恭，随便写些认识与感想。

先扯一段闲篇——

几年前，我省作协编辑了一本《辽宁作家词典》。编者把成稿送过来要我审阅。当我翻到“苏”姓作家词条时，发现只有两位“60后”的年轻作家，便问：

“你知道苏方桂吗？”

编者答曰，看过他的《罗浮侠女》、《羊城巧王》，他是一位很有名的小说作家。

我问：“知不知道他是辽宁人？”

“知道。”

“那为什么不把他列进来？”

回答是：“他现在广东，不是辽宁作协会员”。

“本书名字是《辽宁作家词典》，并非《辽宁作协会员词典》。只要是著籍辽宁的现当代作家都应该收进来。”我说，“你看旧日的《盖平县志》，它就收入了金代的大诗人王庭筠，他也是熊岳人，是苏方桂的异代同乡。其实，王庭筠很小就离开了家乡，而苏

先生二十岁之后才南下广东，他的处女作《神鱼》发表在《辽东文艺》上，早期作品多以辽南为题材，‘文革’中下放回乡劳动三年，我省春风文艺出版社曾约他创作十部系列传奇小说，1990年广东召开‘通俗文学暨苏方桂作品研讨会’，辽宁省委宣传部还致电祝贺过。”

他说：“你说的有道理。可是，中国作协也是按照这个体例来编《作家词典》的。”

上行下效，这就没有可说的了。下面还是“书归正传”，回到写序的正题上来。

古人解释“序”字，说“序者，绪也，谓端绪也”。意思是，通过序言、绪论，帮助读者理出一个头绪来。这个“头绪”，既可以指作品本身，又可以向前延伸到作者的行藏身世、胸襟怀抱、创作流变、成功路径及具有普遍性的经验。我一向认为，作品摆在那里，尽可由读者自己去欣赏、去发现。真正的艺术品，总是具有无限的可阐释性，展现出无比丰富的自在空间。随着读者的视角、趣味不同，必然是“言人人殊”，结论各异。而序言充其量也只是一家之言，原无须像撰写作品评论那样，细针密缕，辛苦饶舌。就是说，与其在字数有限的序言中下大功夫解读个别作品，倒莫如着力于对隐藏在作品后面的作者及其创作路径进行切实而中肯的剖析。正所谓“鸳鸯绣出从君看，更把金针度与人。”孟老夫子有言：“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文如其人”，“知人论世”，这在中国，原是有悠久的文化传统背景的。

苏先生在几十载的文学征程中，取得了卓然可观的成就，他的成功经验是多方面的。这里只想就我个人感受最深的谈几点看法。

作为一位以通俗小说创作为主导的作家，他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强烈的群众观念、读者意识。这种观念与意识来源于自觉的社会责任感。在他看来，作家的真正价值取决于他对人民群众的尊重程度与服务程度，也就是在何种程度上适应了人民群

众积极健康的审美需要，在何种程度上促进了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全民精神生活质量的提高。这是一个关涉到创作方向、创作道路的根本性问题。他从自己的长期创作实践中切实地体悟到：“作家的幸福只有一种——把心血凝成的果实捧给读者。”为了给人民大众提供丰富多彩的精神食粮，他孜孜不倦地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从而使作品更能贴近自己的民族与民众，也更易于为广大民众所接受；他经常注意通过信息反馈掌握读者的多层次、多角度的审美需要，尽一切努力满足受众的要求。

十分难能可贵的是，他有一种高度的创作自觉与创新追求。如所周知，他所从事的通俗小说的创作，在中国是有着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和深厚的群众接受基础的。既然悠久，就很容易陷入固有的窠臼，难以摆脱因袭的重担；而群众基础的深厚，一般地说，又会自觉不自觉地满足于可观的买方市场。特别是作为一位对于这种体裁已经驾轻就熟的知名作家，很容易见好就收，知足知止。而方桂先生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的不断探索、刻苦追求新的境界的创新意识。他说：“我们应该在继承传统的同时，改造传统，逐步注入新的‘流质’，引导群众的审美趣味向健康的深层次、多层次发展。”通俗小说以情节取胜，但长期以来，有些作品存在着片面追求热闹，而忽视人物性格，或者虽有性格刻画却与情节脱节的偏向。他在写作中尽力创造血肉丰满的典型性格，特别注重“情节——性格的历史”这一创作规律，使情节服从性格、服务于典型塑造。再如，中国古典通俗小说，一般都不作环境与心理的描写，他在创作中借鉴西方小说的成功经验，加以适当的吸收。这里所谓“适当”，是指避免像某些西方文学作品那样，大段大段的静态描写，因为它不合乎中国一般读者的审美习惯。有取有舍，避短扬长，不断开辟新的路径。他在向新派武侠、传奇小说借鉴的同时，注意戒除其神化人物、虚无缥缈的缺陷，把要写的题材放在独特的历史环境和文化背景中去展现，努力挖掘历史事件本身所蕴含的传奇因素，使人物活动与情节发展根植于

深厚的现实土壤之中。

阅读他的大量作品，不能不钦服他的丰富的艺术想像力和虚构能力。小说里的人生是蒸馏过的人生，既是从生活里来的，却又不是原样照搬，而是经过艺术加工，成为人生的精髓。可是，现在许多作品以所谓“写实”为标榜，热衷于现实情景的仿真、重复、模拟日常视听中的生活表象，新闻式地、被动式地还原生活，缺乏对“文学是一种原创行为”的理念的高度自觉。这种小说纪实化、电视复制现实生活场景、新闻语言互相模仿、科幻作品缺乏的现象，都标志着当代作家想像力的匮乏。而方桂先生在创作历史题材作品时，对于人物的情节铺排、性格塑造，都煞费苦心，调动自己丰厚的生活积累和渊博的历史知识，充分发挥艺术想像力，不断撩起读者的阅读欲望，并且能够结合情节设置的需要，穿插一些人们感兴趣的知识性、趣味性内容，显得五彩缤纷，花团锦簇。想像力的丰富，应该说是以编织情节为能事的绝大多数通俗小说作家的特长，方桂先生不同凡俗之处，在于虚构、想像的同时，特别注重不脱离历史真实，符合人物自身性格内在变化规律。这是他的小说的优势所在。

好了，序言到此打住。因为记起了著名学者赵元任先生的话：“会看书的喜欢看序；但是，会做序的要做到叫看书的不喜欢看序，叫他愈看愈急着要看正文，叫他看序没有看到家，就跳过了看底下。这才算做序文做得到家。”我猜想，这篇序言大概也“做得到家”了。就是说，读者肯定早已急着想看作者的小说了。

王充闾

二〇〇九年立春之日于沈阳

（作者系当代著名散文家。曾任中共辽宁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辽宁省作家协会主席。）

看似寻常最奇崛

(序二)

通俗文学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先秦的寓言故事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志人小说,再到唐代的传奇小说,宋元话本小说、明代的拟话本小说、清代的章回小说,通俗文学成就了中国文学的许多经典著作。近代以降,张恨水、秦瘦鸥、周瘦鹃、还珠楼主等人的作品,也堪称风靡一时。改革开放之后,金庸、梁羽生、古龙的武侠小说、高阳的历史小说、琼瑶的言情小说、梁凤仪的财经小说等,都在不同时期掀起阅读风潮。而新世纪网络的兴盛,更是带动了民间写作的热度,各类通俗作品不时引发话题。可以说,通俗文学一直久盛不衰,拥有庞大的受众基础,但往往又与争议相伴随,其文学价值与存在意义历来众说纷纭。其实,通俗文学并不代表着流俗、低俗、庸俗,等而次之,等闲视之。宋代王安石有云:“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文学与作家的生活经历、知识建构等息息相关,文学作品来源于思想结晶,关乎世道人心,是审美理想、文学追求、艺术趣味的集中体现。文学之通俗,笔触须直通世俗的核心世界及其精神实质,充分挖掘出审美的愉悦、消遣的闲趣,才能扣人心弦引发共鸣。

晋代陆机说:“非知之难,能之难也。”对于通俗文学,懂其门道也许并不难,善于动手写好却是难上加难。苏方桂先生以57年的漫长写作实践,奉献出厚重的《苏方桂文集》,让我充分感受到了这份难能可贵。他以洋洋500余万字的浩大工程,呕心沥血

构筑起了独具个性的通俗文学世界,做到“大众”与“传奇”的完美结合,散发出文学传播的魅力,臻至一种高贵、高雅、高品位的境界。

其高贵,在于有精神追求。通俗文学必须具有娱乐性,这是衡量此类作品的标准之一。苏方桂没有将作品当作激发人类原始快感的工具,忽视对人类精神的升华与启迪,他很好地处理了几重关系,即轻松活泼而不推卸责任,消遣解颐而不躲避崇高,“文以载道”并不因为“通俗”而走上斜道或邪道。其作品站在大众的立场上探究历史、观察生活、提炼素材、塑造人物,情节语言通俗易懂,故事线索清晰完整,文笔纵横捭阖,摇曳生姿,不管是写回肠荡气的江湖侠义、缠绵悱恻的男女情爱,还是展现冷暖人生、爱恨情仇,归根结底仍是讴歌积极进取、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从道德层面上知世论人,分寸把握恰如其分。譬如《梅娘曲》,讲述的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东南亚各国纷纷成立华侨支援抗战组织,惠州籍爱国华侨青年刘唐俊和梁珊娜毅然归国参加东江华侨服务团,救济难民,救治伤员,与国民党顽固派、日本特务展开激烈的斗争,他们的爱情也在斗争中经受住了考验。作品弘扬的是爱国主义、民族品格和社会正气,读来令人热血沸腾、心潮澎湃。《羊城丐王》描绘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清朝末年罗浮山和尚凡了(后改名秦起凤),参加反清帮派洪门,在洪门启动下参加辛亥革命活动,组织丐帮人员在荷枪实弹的曝尸场抢出了七十二烈士遗体,安葬在黄花岗。苏方桂努力挖掘历史事件蕴含的传奇因素,善于营造浓重的时代氛围,塑造人物的忠贞形象,使作品具有厚重感。综观其一系列作品,希冀国泰民安、反对强暴压迫、同情弱者平民,主张仁爱忠孝、推崇诚信知报、敬重修己慎独等等,都属于主流思想和主导精神。文学作为文化形态的重要方面,对建设精神家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开放昌明,必然要求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努力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样中谋共识。而苏方桂在作品中弘扬崇高精神,坚持以文化人,这是超越

一般通俗作品的可敬之处。高雅因而自蕴其中。

其高雅,在于有艺术探索。苏方桂的创作在审美意识、审美方式、价值取向上与中国古典通俗小说一脉相承,同时在题材、主题、内容、手法、风格、语言上进行有益的尝试,他汲取文言文游记的营养,描写环境简练到位,还一改通俗文学以情节取胜的创作套路,注重渲染气氛、塑造人物形象、挖掘角色内心、描写性格变化,使得作品的艺术含量大大增强,达到一个较高的美学层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尊重历史真实,做到史书有据,作品的时代背景符合客观的历史存在,历史人物的描摹也决不违背史实记载,各民族风俗经过实地考察,绝非胡编乱造,正所谓“山木为良匠所度,经书为文士所择”,虚拟的文学人物根植厚重的历史土壤,提升了作品的文化内涵和思想深度。《羊城丐王》可以看作苏方桂创作特色的集大成代表,其中塑造的人物性格复杂立体,情节曲折生动,丝丝入扣,丐王秦起凤既侠义勇为又狡诈油滑,既浸染江湖恶气又具家国情怀,作品将个人侠义行为与国家、民族的兴衰存亡联系起来,不落个人恩怨情仇和江湖英雄争霸的窠臼,突出人物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品格,作品呈现出了一种大格局、大气度。《和硕格格》讲述大清定南王孔有德之女和硕格格孔四贞,自小在宫廷长大,与康熙有情,后遵旨嫁给广西将军孙延龄,她美丽多谋、野心极大,夺取丈夫的军权,与吴三桂叛军激战,协助康熙平定了“三藩之乱”,维护了国家的统一,死后康熙为她修了专坟。作品善用想象,创造意境,人物刻画栩栩如生,人物成长经历脉络清晰,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语言讲究,多处巧妙地以古典诗词的蕴藉含蓄、韵味隽永烘托爱情故事,充满写意的质感,精炼却传神,通俗却优美,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

其高品位,源于尊重群众的审美趣味。清代顾炎武说:“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文学有诸多功能,但说到底还是需要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才能发挥效应。客观而言,经济长足发展、社会长期稳定、文化

日趋多元的时代,大众社会、文化心理往往更倾向于轻松、休闲。但如何契合读者审美心态的转移,做到尊重而非迎合,满足而非迁就,通俗而不降格,雅俗共赏,至俗至雅,这当中蕴含着—门学问。阅读苏方桂的作品,可以充分领略到他诚恳的创作态度,他始终坚持向人民学习,为群众写作。多年来,他走街串巷、跋山涉水,足迹踏遍粤、湘、桂、滇数省,进行艰苦深入的采风活动,多方了解各地的历史文化环境。他的作品洋溢着可贵的平民意识,注重劝谕和市井生态心态的描写,常常讲述群众熟悉的生活,表现群众普遍认同的人生趣味和人格理想,铺陈传奇也以较强的故事性、情节性满足大众审美需要,其创作体现着主流的审美意识、审美方式、审美愉悦,而非一味地投契消遣娱乐、闲适享受、寻求刺激的阅读心理。譬如《烟花妃子》,故事出自“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民间传说,作品以陈圆圆一生坎坷的命运为主线,反映明末清初的历史风云,创作的旨意却是为“女人是祸水”翻案。阅读苏方桂作品,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有,他努力反映岭南民俗风情,也取得了相应的艺术效果。譬如《南国红颜劫》,把故事发生地点设置在珠江三角洲,塑造“自梳女”、“妹花”等深具岭南民俗风情的典型形象,展现“嫁死鬼”、“买门口”、“送看妹花”等神秘生活场景,看似热闹通俗,实质内涵丰富,作品情节环环相扣,人物性格鲜明,极富艺术吸引力。不仅广东读者会倍感亲切,岭南以外的读者也会通过作家匠心独运的表现手法,了解珠江三角洲独特的民俗风情,对旧时代女性追求自由解放之艰难感同身受。抓住文学观念、创作格局趋于多元的有利时机,苏方桂还把多部小说改编成为影视作品,在广东作家中较早尝试文学与影视的互动尝试,使文字与图象的优势实现互补,更好地发挥艺术的感染力,满足不同层次的文化审美需求。回顾苏方桂的创作生涯,善于研究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特点新趋向,能够密切把握群众审美需求的新变化新规律,以群众是否欢迎、是否满意作为衡量创作成败得失的重要标准,可算是他的一大法宝。我

也认为,作品面向群众、反映群众、服务群众、接受群众检验是文学价值的重要体现,曲高未必和寡,而只要是能够使人民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的精神产品,正面引导社会公众的审美倾向,无论高低,都应受到欢迎和鼓励,文学才有繁荣的百花园。

清代纪昀说过:“心心在一艺,其艺必工;心心在一职,其职必举。”苏方桂属牛,在通俗文学的园地里,他犹如勤恳有加的牛般矢志不移、满腔热忱地埋首耕耘,共计创作长篇小说15部、中短篇小说5部,在牛年推出收入六部代表作的个人文集,这份甘甜自是不言而喻的。如果说侠客高手十年磨一剑,可以一剑封喉,那么,近60载专心浸淫一种文学领域,也定是一位可敬可佩的通俗文学“牛”作家了。我想,读者诸君可感受到的是,在一段段叹为观止的传奇背后,作家自身也是一个“传奇”。是为序。

廖红球

(作者系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党组书记)

惠州一笔不可多得的文化财富

(序三)

—

苏方桂先生已年逾古稀。他13岁开始发表作品。1957年学校毕业后就从遥远的东北来到惠州博罗,先后担任企业报编辑、县文化馆馆长、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文联副主席,目前仍担任市作家协会主席,半个多世纪都奋斗在文化战线。重要的是,这么多年远离繁华大都市,他仍成为一位丰产优产的当代作家,同时也是一位在全国范围产生了较大影响的作家。

我尚在老家读小学时,就熟悉他的名字,知道县文化馆有一位才华出众的年轻馆长。我在北京工作时,听闻他早已成为惠州名气最响的作家之一,凭一部接一部的长篇小说以及由小说改编成的电影与电视连续剧,享誉大江南北。内心里,我为家乡出了这样一位文学大家感到自豪。我来惠州工作已有10多个年头,这期间和他有一些交流,还多次参加他组织主持的文学活动,对他的为人、为文,也就有了相对全面与深入的了解,更由衷感到他是一位德艺双馨的文学大家。

从13岁开始文学创作到如今七旬有二的长者,方桂先生爬格子几乎爬满了一个花甲。他陆续出版了21部书,加上话剧剧本、电视剧本以及散见于各报刊的杂文、随笔等,达500余万字,真是著作等身,委实不容易。长篇通俗小说创作是他的强项,现

在,他好中选好,从创作的多部长篇通俗小说中精选出6部,由出版社隆重推出一套文集,堪称一台丰厚的文学大餐、精神大餐。对于刚刚夺得全国文明城市金牌、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又致力于建设文化大市的惠州,更是一笔不可多得的文化财富、精神财富。所以,这套文集的出版发行,是文坛盛事、惠州盛事。方桂先生嘱我为这套文集作序,我是乐意接受的。

二

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乃至一个城市,从来就既需要物质层面的创造和建设,同时又需要文化领域的创作与传承,物质和精神产品同等重要。而文学又是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所以,文学在人类的进步中,在人文精神的弘扬中,因其地位的重要性而必得负责,必得有所担当。毫无疑问,这里所指的文学,主要是指文学作品。作品的品质必须是优秀的。那么,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才够得上优秀呢?这也是一个见仁见智的大课题。

胡锦涛总书记曾明确指出:“一切进步文艺,都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一切进步文化工作者的艺术生命,都存在于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之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说:“无论是什么文学体裁,都要充当人类精神和思想的助产士,使人们理解、向往并追求真理、善良和美好……我们的文学家、艺术家应该寓社会价值于文化作品之中,用艺术的手段提示真正的社会价值。”英国作家毛姆说:“艺术若要作为人生的一大价值,它必须培育人们谦逊、宽容、智慧和高尚的品德。”

我认为,这些观点和论断,高屋建瓴,已经鲜明地告诉我们,什么才是优秀的文学作品,什么才是优秀的作家。关注民生,贴近百姓,置身火热的生活,并且恪守与保持文学自身的规律与要义,对心灵负责,对社会负责,敢于面对与担当,是任何一个有良知、有道德感的作家所必须具备的,也是其必须在作品中呈现出

来的。优秀的作品，必须能够塑造美好的心灵，风成化习，果行育德，使读者获得精神上的愉悦和灵魂上的震动与洗礼。

显然，方桂先生深谙此理。我虽然来不及一一细读他的作品，但从断断续续的翻阅中，每每被书中的情节所吸引，被书中的人物所打动，被书中的道理所折服。我感到他的作品一是好看，二是有用，从而也认定他是一位负责任的作家。他的作品，优美流畅的文字、出奇不意的结构布局，都是特色，但艺术价值远远没有停留于这些形式层面。作品通过丰满的人物形象，在个人道德修养和社会责任担当上有明晰的指向，故而能够产生较大的教化作用，读者可以在轻松愉快的阅读中获得教益。

三

前面已经提到，方桂先生的创作是以长篇通俗小说为主的。这里不得不指出，在一些人的观念里，通俗文学似乎难登大雅之堂，甚至有人说，通俗文学迎合的是读者的低层次审美趣味，无疑，这是错误的观点。不妨想一想，中国包括四大名著在内的传世小说作品，通俗文学是不是占据绝大多数呢？欧美的传世佳作，多半也是通俗文学。

马克思曾说：“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现着无穷无尽的色彩”。引申到文艺创作上，就应该讲求多样化。我以为，优秀的通俗文学，不但层次不低，反倒会比其他门类的文学作品更能得到大多数读者的青睐。一是因为其具备民族传统的审美魅力；二是具备非常好看的情节，足够吸引人。可以说，每个时代，每个读者群体，都需要高品位的通俗文学，也都会欢迎优秀的通俗小说作品。事实上，别说金庸、古龙、梁羽生的通俗小说影响了多少人，就是从方桂先生出版的长篇通俗小说备受读者欢迎、曾有过单本销量突破200万册的纪录来看，就足以证明通俗小说的魅力与影响力。

方桂先生是一位熟知历史特别是清史同时又深谙社会现实的通俗文学作家。与新派武侠、传奇小说不同的是,他笔下的人物并未神化,并未缥缈虚无超越尘世。相反,他将自己要写的题材放到独特的历史环境和文化背景中去展现,努力挖掘历史事件本身所蕴含的传奇色彩,从而使作品根植于历史厚土中,散发出浓烈而独特的艺术魅力。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仅有极强的编织故事的能力,对风土人情的把握亦令人叹为观止。如他在长篇小说《羊城丐王》中对广州清末民初的民俗民风的描写,堪称淋漓尽致,力透纸背。

可以说,方桂先生以通俗小说面目出现的作品皆具备相当高的审美价值,哪怕是历史题材小说,也都反映了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刻画了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展现出了道德与人性的光芒,发挥了启迪思想、升华灵魂、鼓舞人心的效用。

四

前文已经提到方桂先生是一位多产优产作家。从我手边的资料获悉,他著有的故事集有《荷花与莲蓬》、《苹果姑娘》、《望儿山故事》、《罗浮传说》;中短篇集有《美狄亚行动》、《烛光集》;长篇小说有《罗浮侠女》、《五羊恩仇》、《冤家成亲》、《离乱鸳鸯》、《虎穴剑影》、《浊世佳人》、《梅娘曲》、《妹花风尘记》、《康熙的情人》、《羊城丐王》、《黑煞与红煞》、《女人花》等。这次推出的《苏方桂文集》包括《梅娘曲》、《罗浮侠女》、《羊城丐王》、《南国红颜劫》(又名《女人花》)、《和硕格格》(又名《公主坟传奇》)、《烟花妃子》等6部。

《梅娘曲》写抗战爆发后,东南亚各国纷纷成立华侨支援抗战的组织,惠州籍爱国华侨青年刘唐俊和梁珊娜毅然归国参加东江华侨服务团,救济难民,救治伤员,与国民党顽固派、日本特务展开激烈的斗争,他们的爱情亦在斗争中经受考验,情节曲

折,可歌可泣。《罗浮侠女》写明末清兵入粤,汉族人民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抗清斗争,罗浮侠女李若竹与丈夫张家璧被卷入这股怒潮,在博罗、东莞、广州等地与清兵展开殊死斗争,情节环环相扣,人物性格鲜明,极富艺术吸引力。《羊城丐王》写清末罗浮山和尚凡了(后改名秦起凤)参加反清帮派洪门,在洪门启引下参加了辛亥革命活动,组织丐帮人员在荷枪实弹的曝尸场抢出了七十二烈士遗体,安葬于黄花岗。本书描绘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并将广东民俗与情节相结合,塑造了性格多面的丐王秦起凤。《南国红颜劫》写罗浮山兰石村女童荔红被人贩子拐卖到广州,落入自梳女大姐大之手,培养成“妹花”,嫁给广州将军为妾,辛亥革命爆发广州将军被暗杀,她被骗入卖淫的尼庵,后又流落江湖被丐帮小头目霸占,跳出后参加了辛亥革命,壮烈牺牲。《和硕格格》写北京公主坟的主人和硕格格孔四贞是大清定南王孔有德之女,她自小在官院长大,与康熙有情,后遵旨嫁广西将军孙延龄。她美丽多谋,野心极大,夺了丈夫的军权,与吴三桂叛军激战,协助康熙评定了“三藩之乱”,维护了国家的统一,死后康熙为她修了专坟。《烟花妃子》写陈圆圆,以陈圆圆一生命运为主线,反映了明末清初的历史风云。

这些产生过巨大反响的长篇小说再次结集隆重推出,无疑会产生更广阔更深远的影响。

五

俗话说文如其人,著述如此之丰的方桂先生为人也一直广受称道,熟识他的人对他赞誉有加。他写的长篇散文《我的五位文学老师》,相信会让很多作家产生共鸣。外婆讲的故事;路人讲的故事;蒲松龄讲的故事;无名编辑的厚爱;大家秦牧先生的教诲。从幼年到少年再到青年,这5位“老师”给他的文学养分是积极的,丰厚的,既影响了他的为文,更影响了他的为人。我查看了